

“君子忧道不忧贫”所见儒家内圣外王之道

王一冰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尼山学堂，山东 济南 250100

DOI:10.61369/HASS.2026050002

摘 要： 本文围绕《论语》“君子忧道不忧贫”文句展开疏解，综括汉郑玄、宋邢昺、朱熹、明张居正、清康有为、刘宝楠等历代经儒的注疏观点，归纳为劝学取禄、修身明本末、经世励士三类诠释范式。在此基础上不阐发时代学术语境中学与道的内在关联，提炼出汉儒循外王以进道、宋儒守内圣以明道、清儒切时务以警世的三种解经理路。历代诸家诠释虽切入角度与义理侧重各异，然均以“君子”为核心主体、以求道臻至为终极旨归，充分彰显儒家内圣外王贯通、修己安人一体的思想内核与儒者理想人格范式。

关 键 词： 《论语》；内圣外王；君子忧道不忧贫

The Confucian Approach to Internal Sagehood and External Kingship as Seen in "The Gentleman Worries About the Way, Not About Poverty"

Wang Yibing

Nishan Academy,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he phrase "The gentleman worries about the Way, not about poverty" from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t synthesizes the annot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various scholars throughout history, including Zheng Xuan of the Han Dynasty, Xing Bing of the Song Dynasty, Zhu Xi, Zhang Juzheng of the Ming Dynasty, Kang Youwei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Liu Baonan, categorizing them into three interpretive paradigms: encouraging learning for official positions, cultivating oneself to understand priorities, and inspiring scholars for practical governance. Building upon this foundation,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learning and the Way within the academic context of different eras, distilling three interpretive paths: Han scholars advancing the Way through external kingship, Song scholars elucidating the Way through internal sagehood, and Qing scholars addressing contemporary issues to caution the world. Although the interpretations of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dynasties vary in their perspectives and emphasis on meaning and principle, they all center on the "gentleman" as the core subject and the pursuit of the Way as the ultimate goal, fully demonstrating the Confucian thought of integrating internal sagehood with external kingship, cultivating oneself and bringing peace to others, as well as the ideal personality paradigm of Confucian scholars.

Keywords：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ternal sagehood and external kingship; the gentleman worries about the way, not about poverty

引言

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人生命的底色。孔子主张仁智双彰，其中“仁”也是“道”，所代表的是道德层面的修养；“知”所代表的，是知识层面的积累。道，学，君子三者构成了先秦儒家知识论的基本内容，其中“道”所代表的是儒家核心追求和理想，“学”是至道的方法，“君子”则是求道的基础与主体所在。“君子学以致其道”，是“尊德性”和“道问学”的统一，是该问题的精义所在。

孔子有自己的终身之忧：“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忧道不忧贫”内容丰富，不仅揭示了道，学，君子三者之间的关系，还表现了儒者内圣外王的人格境界追求，值得我们推敲品读。

一、历代解释：自汉以来的不同解释路径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1]

这句话的大意是：君子谋求大道而不谋求衣食。耕种免除了饥饿，学习却有机会得到俸禄。君子谋求大道而不担忧一时之贫。

与此内容很相像的是樊迟请稼：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2]

樊迟向孔子请教种庄稼，种菜蔬，孔子说这些专门的技艺我不如老农夫和老菜农。认为治国理政的关键在于统治者的德行，统治者治国用礼好义，讲信爱民，人民自然信服，国家自然安定和谐，富强富庶而无饥贫之忧。

这传达出孔子的教育目的和人才培养要求：孔子要教的是治国理政，造福四方的君子，而不是掌握专门技艺，谋求个人衣食的小人。君子不器，君子要做的，是内修德行，外化百姓，造福四方。宋代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便是儒学的要义和儒家理想人格所在：抵达内圣外王的圣人境界。

因此对“忧道不忧贫”一则的理解首先应当建立“君子”的主体地位，理解“君子”与“道”的内涵：君子以学至道，有道有位，兼济天下。

对于“君子忧道不忧贫”一则，历代大儒都有过对此则的解释，其体现了孔子思想中的对道的终身之忧，揭示了“学”与“道”的关系：

1.（汉）郑玄

馁，饿也。言人虽念耕而不学，故饥饿。学则得禄，虽不耕而不饥。此劝人学也。^[3]

今按：郑玄的解释以“劝学”为出发点，疏通经文大意，简明扼要，是基于经文本身的理解。

2.（宋）邢昺

正义曰：此章亦劝人学也。人非道不立，故必先谋于道。道高则禄来，故不暇谋于食。馁，饿也。言人虽念耕，而不学则无知，岁有凶荒，故饥饿。学则得禄，虽不耕而不馁。是以君子但忧道德不成，不忧贫乏也。然耕也未必皆饿，学也未必皆得禄，大判而言，故云耳。^[4]

今按：邢昺延续郑玄“劝学”的理解，进一步进行阐释，人以道为本，由学谋道，道高得禄。

3.（宋）朱熹

耕所以谋食，而未必得食。学所以谋道，而禄在其中。然其学也，忧不得乎道而已，非为忧贫之故，而欲为是以得禄也。

尹氏曰：“君子治其本而不恤其末，岂以在外者为快乐哉？”^[5]

（四书或问）曰：杨、尹之说得之。范氏所谓“馁存焉，禄存焉”者得之，其曰“未必得禄”以下，则于文势缭绕而不伦焉。其所谓“治本而不恤末”者，虽若得之，然其所以为说者，亦非也。吕氏易忧贫以忧道者善矣，然亦非本文之意。谢氏能处贫之说，亦非也。君子之于贫贱，自不足以动其心，非以其来既不可却，而吾复有以处之，然后不以为忧也。尹、侯氏以耕而谋食为学以进道之譬，而以求禄为不谋食，意亦善，但文势不甚平正。此外则胡氏之说，亦有所发明也。

胡氏曰：圣人之教，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各因其材而发达之。谋食忧贫，识致之最下者，亦必诱掖使不沦陷于卑陋也，言虽平常，意则高远矣。^[6]

今按：朱熹等人的理解体现了宋明理学视角下的经学阐释，以本末进行阐释，认为为学忧道是治其本，不忧贫是不恤末。治其本而不恤其末，其忧乐在我而不在人，以为己之学而至道，宋儒气象高远。

4.（宋）陈祥道

耕者志于利而害在其中，学者志于道而利在其中。君子所以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也。《诗·权舆》则谋食，《北门》则忧贫，何耶？《权舆》之谋食也，实非谋食也，责其礼之不至也。《北门》之忧贫也，实非忧贫也，伤其志之不得也，与徒餽啜、羞贫贱者异。^[7]

今按：耕者求利而不得，学者志于道而利在其中，求者未必得，而得者不必求。

5.（明）张居正

谋，是图谋。馁，是饥饿。孔子说：“人之所以终日营营而不息者，都只是谋图口食，干求利禄而已。乃若君子之人，其所图惟于念虑者，只在求得乎道焉耳。至于口食之求，则有所不暇计者，盖食之得与不得，不系于谋与不谋。如农夫耕田，本为谋食而求免于饥，然或遇着年岁荒歉，五谷不登，则无所得食而饥饿在其中矣。君子为学，本为谋道，固无心于禄，然学成而见用于时，则居官食俸，而禄自在其中矣。夫求者未必得，而得者不必求。则人亦何用孳孳以谋食为哉？是以君子之心，惟忧不得乎道，无以成性而成身；不忧无禄而贫，而欲假此以求禄而致富也。”君子立心之纯有如此，人臣推此心以事君，敬事而后食，先劳而后禄，斯可以为纯臣矣。^[8]

今按：张居正强调君子立心，应存其大者以忧其道，富与贵求者未必得，而得者不必求。德福一致，有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因而学以求其大而其小自得。

6.（清）康有为

耕所以谋食，而未必得食；学所以谋道，而禄在其中。然学也者，明其道正其谊，而非为谋利也。故忧道之不明，忧道之不行，而未尝以贫焉忧。常人戚戚忧贫，故皇皇谋利，而未见利之可得；君子皇皇谋仁义，未尝谋利，而富贵乃为君子所有。此劝人

择术，务其上者可，不求其下；得其本者可，不恤其末也。樊迟请学稼，沮溺、丈人、荷蓧皆隐于耕，盖士不易得禄，故皆躬耕而废学，故孔子戒之。今之人士多营农商而废学，亦孔子所戒也。^[9]

今按：康有为解经联系现实，经世致用。认为君子择术要务其上，不求其下，从今之士人因学之难，废学经营农商，是夫子所戒。

7.（清）刘宝楠

段本《说文》：“饩，饥也。”此常训。“念耕”者，念犹思也，本非所习而思焉之，故曰“念耕”。古者四民各习其业，自非有秀异者，不升于学。春秋时，士之焉学者多不得禄，故趋于异业而习耕者众。观于樊迟以学稼、学圃焉请，而长沮、桀溺、荷蓧丈人之类，虽隐于耕而皆不免谋食之意，则知当时学者以谋食焉亟，而谋道之心或不专矣。夫子示人以君子当谋之道，学当得禄之理，而耕或不免饩，学则可以得禄，所以诱掖人于学，而凡焉君子者，当自勉矣。郑谓“念耕而不学”，谓士之焉农者，但务农而不焉学也。既不学不可得禄，故或遇凶歉而不免于饩，是两失之矣。若夫农务于耕，自习其业，安得概以“谋食”责之？《潜夫论·释难》篇释此文云：“君子劳心，小人劳力，故孔子所称，谓君子尔。”谊与郑同。夫耕原于谋食，谋食即不得不忧贫。君子志其大者远者，但忧谋道之无得于己，而岂口腹身家之图所能易其志哉？”^[10]

今按：刘康二人皆认为夫子此言的原因与士之焉农者的社会现实有关。认为君子应怀其大者远者，不因私欲改易其志。

这些解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体现出不同阐释系统之下视角的不同：

以劝学达禄作为解释的出发点：如郑玄，孔颖达；

以修身本末作为解释的出发点：如朱熹，陈祥道；

以经世致用作为解释的出发点：如康有为，刘宝楠，刘宗周。

二、“学”与“道”关系体认

以上对“君子忧道不忧贫”的三类解释出发点有所不同，但其所至相同，前提一致：都是以“君子”作为立论的主体，以达道作为最终的理想追求，其中差异之处在于路径。体现出不同阐释体系影响下对经文解读的差异，反应出特定时代背景与学术思潮下学者对“学”与“道”关系的认识。我们对此进行逐个分析：

（一）学而优则仕，由外王至道

首先是以郑玄为代表，由“劝学”为立论出发点对“君子忧道不忧贫”一则的阐释，其主要解释路径大致如下：“劝学——谋道——重在学——外王——得禄（得位）——达道——由外王至道”。

认为“君子忧道不忧贫”一则的出发点在劝人学习，以谋求

大道，其重心在学。其背后体现的本质是由外王至道，以学之功进而得禄有位。

郑玄的解释着重从文本出发，训诂通其大意，更加倾向于与现实政治相联系，重视“外王”，建功立业。这与汉儒解经重视名物训诂，疏通经文大意的特点有关，其训诂的目的在于解读经书，以训诂通大意。同时，汉武帝时设立五经博士，通经与出仕利禄相联系，因而求学通经就能得禄有位，求学之路也是利禄之路，“学”的重要性也大大提高。学而优则仕，由学而通经，由通经而得禄，得其位而谋其政，施行德政以达大道。

（二）本立而道生，由内圣至道

其次是以朱熹为代表，由“本末”为立论出发点对“君子忧道不忧贫”一则的阐释，其主要解释路径大致如下：“本末——明道——重在道——内圣——得道——有禄（得位）——由内圣至道”。认为“君子忧道不忧贫”一则的出发点在探明本末，以修身为本，立本而明道，其重心在道。其背后所体现的本质是由内圣至道，从而得禄有位。

朱熹的解释着重于义理的阐发，更重视个人内在品性的修养，重视“内圣”，修身养性。这与宋儒解经由训诂通义理，通经明道的特点有关，其训诂的目的在于通经明道，以训诂求义理。同时，宋代真正实现了儒释道三教的融合。以“理学”作为精神世界的宋儒，重新构建了心、命、气、理的形而上经解体系。宋人更重视内圣，“本末”的重要性自然提高，重视个人的修身养性，在意念之间摒恶存善，在言行中散发圣贤气象。本立而道生，由修本养性而明道，达道而得位，由位有禄，推己之德行化育百姓，以至圣贤。

（三）经世致用，警戒士人

最后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由“经世致用”为立论出发点对“君子忧道不忧贫”一则的阐释，其主要解释路径大致如下：“士弃学为农、商——择术求其上——行道——重在实践——得道——有禄（得位）——警戒士人”。认为“君子忧道不忧贫”一则的出发点在于士弃学为农的社会现实，警戒士人，择术应求其上，以学谋道，行道实践，从而有禄得位。

康有为的解释联系社会现实，更加富有说教和警戒的意味，重视经文与社会现实的联系。这与清末解经面向现实，发明新意的特点有关。同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的不断壮大，清朝时期商人群体不断壮大，为官从商者亦有，对士人的价值取向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为学之难使不少士子弃学，转而务农经商，舍弃大道。以此语警戒士人，告诫君子应择其上、谋其大，行道贵道，以实践得道，进而有禄。

三、结语

综上，其中以郑玄为代表的“劝学”和以朱熹为代表的“本末”，二者体现了内圣外王的一体两面。无论是学而优则仕，由

外王至道；还是本立而道生，由内圣至道，两者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达道，只是在实践路径和侧重点上有所差异。实际上，对儒家而言，内圣和外王本就是一体的，修己以治人，格致诚正是修己的内圣学；治国而自进，修齐治平是治人的外圣学。

对君子而言，治国外王的政治活动是道德实践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无论是内圣还是外王都是不同层面上的道德修养

活动，是道德实践的非线性过程，两者的关系不能分裂对立，都是以至道为目的的道德修养活动。同样，儒家没有单纯以道德修养为目的内圣，内圣的目的在于外王，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三者便是内圣外王之道的精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八·卫灵公第十五》，《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3年，第167页。
[2]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七·子路第十三》，《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83年，第142页。
[3] [三国·魏]何晏撰，孙钦善校点：《论语集解》，《儒藏》精华编第一〇四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71页。
[4] [北宋]邢昺撰，陈新校勘，沙志利校点：《论语注疏》卷第八，《儒藏》精华编第一〇四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16页。
[5] [南宋]朱熹撰，徐德明校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卷第八”，《儒藏》精华编第一一〇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5页。
[6] [南宋]朱熹撰，黄坤校点：《四书或问》“论语或问卷十五”，《儒藏》精华编第一一〇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56页。
[7] [北宋]陈祥道撰，刘蔷、姜海军校点：《论语全解》卷八，《儒藏》精华编第一〇五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93页。
[8] [明]张居正撰：《四书直解》卷八，《张居正全集》，崇文书局，2023年，第607页。
[9] [清]康有为撰，王守常校点：《论语注》卷之十五，《儒藏》精华编第一〇五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0页。
[10] [清]刘宝楠撰，[清]刘恭冕补，刘宗永校点：《论语正义》卷十，《儒藏》精华编第一〇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12页。